

模拟、挪用与超越：霍米巴巴理论下《小小小小的火》中的母性抗争

张莹凡¹

(1.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以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的混杂性为核心,基于伍绮诗小说《小小小小的火》中华裔底层单亲母亲贝比与艺术家单亲母亲米娅两位少数族裔女性的抗争实践,结合性别-母职维度总结出二者模拟-挪用-抵抗和解构二元对立-建立第三空间的抵抗范式,构建少数族裔单亲母亲抗争策略谱系,完整呈现少数族裔女性在种族-母职双重压迫下的抗争逻辑演进,旨在论证少数族裔单亲母亲可将母职转化为抵抗结构性压迫的策略资源,确立文化身份。

关键词:后殖民;《小小小小的火》;少数族裔女性;抵抗范式;母职抵抗

基金项目:项目来源“混杂、协商与抵抗:后殖民理论视域下《小小小小的火》中华裔移民女性的主体性建构”(SISU2025YZ105)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15

一、引言

在美国华裔文学谱系中,少数族裔女性反抗形象层出不穷,如谭恩美《喜福会》、汤亭亭《女勇士》、任璧莲《典型的美国佬》中在主流社会中面临文化与制度的排斥,又在性别权力结构中承受规训与支配的角色,但是为获取经济独立、重获身体自主权,她们通过协商,在主流规则与本土文化间寻找平衡,既不彻底割裂文化根脉,也不盲目臣服于主流标准,最终形成杂糅性的生存姿态。伍绮诗的《小小小小的火》更是将少数族裔女性的双重困境与日常反抗推向更具现实张力的维度。贝比,作为华裔底层单亲母亲,米娅,族裔不详,被主流社会视为不合格母亲,两人都因身份困境而时刻面临失去女儿的风险。而她们的反抗,恰是对谭恩美、汤亭亭等作家笔下反抗形态的继承与升级。

《小小小小的火》的相关国内外研究,多集中于母性、阶级议题,而缺乏以后殖民混杂性理论为核心框架的深度解读。当前国内学界对霍米·巴巴理论的应用与研究多围绕第三空间、混杂性与文化身份展开,探讨后殖民与全球化语境下小说人物的文化身份认同、身份建构及身份杂糅问题。然而,研究模式多以先引入第三空间或混杂性概念,再分析作品人物在相关框架下的身份协商与文化杂合过程,相对忽视其作为动态、积极的生存与反抗策略的实践过程。在此研究语境下,本文将摒弃身份状态的研究,聚焦于反抗策略的范式研究,通过模拟、挪用、超越三个动态环节,清晰呈现混杂性在微观层面被个体实践为具体抗争战术的过程。

二、米娅的“模拟-挪用-超越”抵抗范式

对于米娅而言,母职的本质是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发展可能,当流浪生活与这一目标冲突时,她选择暂时走进主流规训场域,不是认同其价值观,而是将其视为解决珀尔成长问题的必要空间,这种转向充满母职特有的牺牲与理性,源于对珀尔成长需求的清醒认知,米娅暂时放下对主流社区的排斥,主动融入主流文化社区,以母职责任为核心,重构其“模拟-挪用-超越”策略的实践形态,守护女儿珀尔的成长自主权,捍卫少数族裔单亲母亲的母职合法性(王芳,2023:107)。

首先,米娅的“模拟”²是一种以策略性妥协换取母职实践空间的保护性行为。作为身处种族、阶层与性别多

作者简介:张莹凡(2001—),女,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² 模拟指被殖民者对殖民者文化、行为、话语的学习和重复。但这种模拟并非完全复制,微妙的差异本身就构成了对殖民权威的威胁和嘲弄,是杂交性策略的具体表现之一(巴巴,1994:122)。

重边缘的单身母亲，米娅进入西克尔高地后，面对理查德森家提供的管家工作，米娅以“谢谢你，你真是太慷慨了，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伍绮诗，2018：115）作为回应，以保护女儿珀尔；刻意将公寓空间改造为“日光黄”的厨房、“深香瓜色”的起居室、“蜜桃粉色”的卧室，最终打造出“装满阳光的大箱子”（伍绮诗，2018：132）此时的模拟，是米娅作为母亲的保护性协商：她暂藏对主流母职规训的质疑，确保不被驱逐。实际上，她从不要珀尔迎合社区的完美标准，当珀尔与理查德森家孩子交往时，米娅始终提醒她保持独立思考，避免珀尔被物质至上、循规蹈矩的价值观影响；她坚持用艺术陪伴珀尔，哪怕在西克尔高地的忙碌生活中，仍会带女儿观察生活、创作作品，传递艺术真谛。她没有因驻留而放弃流动的生活底色，而是时刻准备发动停在路边的大众车，随时离开，这些模拟背后的差异揭示白人社区标准母职的话语，暗讽其虚伪性。

其次，米娅的“挪用”³体现为借助主流规则与工具，反向解构其母职规训，并传递自身的母职理念。她擅于将旧物重组为艺术品，通过摄影与装置创作挑战中产阶层的审美与价值标准。艺术创作是米娅进行符号挪用和意义重构的主要方式。米娅擅长将旧家具等别人眼中的破烂拆解并重组为全新的艺术品，攫取现有的文化材料（符号），通过打破其原有的语境和逻辑（拆解），注入新的叙事和生命（重组）。离开时为理查德森一家制作的肖像系列并非简单地复制完美表象，而是通过加入裂开的护胸中发芽的种子、振翅欲飞的纸鹤等元素，实质是用艺术工具解构白人中产标准母职的规训逻辑，使得理查德森家规训下的个体开始反思自身的处境。这些照片挪用了家庭肖像这一传统符号，却将其转化为映照内部裂痕与生命力的镜子，证明主流母职标准下隐藏的压抑与伪装，间接捍卫自己母职方式的合法性；同时，在人际互动层面，米娅向伊奇传递挣脱规训的母职理念，指导伊奇打破束缚，为莱克茜提供流产后的庇护并坚守秘密，让理查德森的子女质疑主流母职标准的合理性，揭露主流母职规训对女性的压迫，强化自己母职应包容而非压抑的主张。米娅的主动挪用让她在适应社区规则的同时，始终坚守自身的抗争立场，避免被主流同化，米娅对于母职的定义影响了贝比，使其找回抵抗的勇气，甚至直接导致白人小女儿伊奇的纵火反抗行为。米娅的母职抗争从个人坚守升级为话语传播，让少数族裔的母职逻辑获得被看见、被认可的可能。

最终，米娅通过“超越”⁴彻底摆脱了主流对母职的垄断性定义，确立了流动且自主的母职形态，实现母职中的主体性。她带着珀尔“辗转四十六处城镇”，将个人物品压缩至“仅能装满一辆大众车”（伍绮诗，2018：145），这种持续流散的生活，是对主流标准母职的直接超越。她用珀尔的健康成长证明，母职的核心是情感联结与自主引导，而非物质条件的固化；离开西克尔高地时，米娅选择将艺术作品留在出租屋，而非带走，再次用艺术作品嘲讽标准母职，彻底讽刺了白人一家的虚伪，以及他们被掩盖起来的被压抑的自我。她不再需要通过模拟、挪用策略获得母职合法性，而是以流动却坚定的母职实践，为少数族裔女性示范了母职可自主定义的可能。从策略性的“模拟”到创造性的“挪用”，再到根本性的“超越”，米娅的母职实践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辩证循环。她以走进主流为起点，却以更坚定地走出为终点。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她带着从主流领域中淬炼出的清醒与力量，重新回归流动的生活，但此时的“超越”已不再是当初单纯的个人反抗，而是背负着对母职更深的理解与更强的守护能力。她的旅程，最终形成了一个以母职为内核、从抗争出发并回归更高层次抗争的圆满闭环。

三、贝比的“二元解构与超越”抵抗范式

性别-母职的压迫形态，在贝比的母性抗争实践中核心体现为种族压迫与母职规训的深度叠加——第一世界女性通过垄断母亲职责的定义权系统性地第三世界女性的母职实践边缘化（金莉，2024：101）。在司法场域中，以第一世界权力逻辑为核心的审判主体，将贝比的产后抑郁、底层收入与短暂弃婴行为，单向度转化为失职母职的定罪依据的行为既无视种族与阶级叠加下，贝比作为华裔移民在医疗资源获取、就业机会、社会支持上的系统性匮乏，更以居高临下的规训姿态，将第一世界白人中产的母职标准作为唯一合法标尺，否定贝比基于族群文化与情感联结的母职实践合法性（王妮，2020：50）。最终，这场审判无异于一场第一世界权力通过司法机制对第三世界女性实施的主体性剥夺：一方面以定罪的形式，将贝比标签化为不合格母亲，消解其母职主张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以夺权的结果，剥夺其对亲生女儿的抚养权，实质是将第三世界女性的母职权利纳入第一世界的规训框架，完成跨种族、跨阶级性别压迫的制度性落地（王元江，2023：52）。起初，贝比因第三世界女性的种族、阶级弱势，被迫陷入第一世界规训，文化迷失状态让其混杂性实践虽处于被动阶段。她曾“跟着爱人从旧金山搬到克利夫兰”，却在爱人消失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没人说中文”“找不到工作”“没人帮我看孩子”（伍绮诗，2018：190），在美国举目无亲的贝比最终患上产后抑郁，将孩子遗弃在消防站。她尝试配合司法系统的探视规则、以乞求式的方式争取与孩子的联结，本质是对第一世界标准母职的顺从。潜藏的母职动力让她始终保留着对不公的觉察：“我先给她打电话了，可她马上就挂了；再打，接起来又挂断”（伍绮诗，2018：256）的委屈倾诉，“我是孩子的亲生母亲，他们这样监视我，是怕我会对孩子不利吗，”（伍绮诗，2018：258）基于贝比地理与文化的双

³ 挪用是从被言说到自我言说的关键转折，是创造性反抗的核心。挪用并重写白人社区的支配性符号，使其脱离原霸权语境并生成新意义，从而在拒绝臣服于主流规训的同时，为自身争取文化存在的合法性（巴巴，1994：112）。

⁴ 超越是当文化边缘主体在既定结构内协商达到极限时，从根本上挑战乃至超越原有体系的逻辑，在二元对立的夹缝中开辟出属于主体的、哪怕是短暂或流动的“第三空间”（巴巴，1990：210-211）。

重漂泊，控方律师在法庭上强调孩子需要稳定的成长环境，却刻意将稳定与白人产生活方式划上等号。贝比在第一世界的母职规训下陷入自我否定，认为自己底层、移民的身份确实不配为母，甚至默认司法系统的判决。

而贝比的抵抗，不同于米娅的模拟-挪用-超越模板，而是打破二元对立-建立第三空间的过程。母职既是她挣脱文化迷失确立主体性的核心锚点，也为她的混杂性策略提供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破的行动内核，二者在不同抗争阶段呈现出递进式的共生关系。让贝比的母职动力从潜在转向显性的，是米娅“这些人为什么要把孩子从母亲那里夺走呢？”“仿佛有人拿刀片割开她的身体，把里面的血肉翻搅出来”，“斗志昂扬，仿佛连鼻孔里都燃烧着火焰”（伍绮诗，2018：258）话语中传递的母职正义。这一解构二元对立的话语以第三世界女性的视角撕开了第一世界公平合法叙事的裂缝。米娅的介入她促使贝比意识到，赢得官司的核心不仅在于夺回女儿美玲，更在于确证自身文化身份与母职实践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在米娅的影响下，贝比完成了从被动承受能到能动协商的主体性蜕变。其反抗姿态的演变清晰可见：从最初面对警察驱逐与麦卡洛夫夫妇拒绝时，只能表现为无力乞求或沉默退让；到后来，她低声告知米娅“观众们支持我”（伍绮诗，2018：258），此举标志着她已初步将自身置于公共舆论的协商场域中，尝试援引外部认同来强化自我主张。她开始有意识地借用第一世界的规训工具，服务第三世界的母职诉求，让混杂性从被动适应升级为主动抗争（刘月莹，2024：45-49）。她最初试图通过学习白人产中产阶层的规则来寻求接纳，她主动学习英语通过法律援助聘请律师在法庭上努力用主流社会认可的方式陈述诉求甚至在探视女儿时精心准备符合中产审美的礼物。在每周仅两小时的监督探视中，她坚持以中文沟通。贝比坚持用中文名“美玲”称呼女儿，拒绝养父母取的英文名“米拉贝尔”（伍绮诗，2018：256），并在探视时用中文交流。然而，这些策略性适应最终在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排斥面前宣告失败司法系统以其所谓理性标准将她的母职实践判定为不合格。当法警架着瘫软在地的贝比离开法庭，她口中发出的“尖锐恐怖的哀鸣”（伍绮诗，2018：256），为她最终潜入白人府邸抱走孩子埋下了伏笔。

四、抵抗范式的归纳：曲线抗争

米娅和贝比二者的母职抗争实践证明，面对强大的主流结构和看似固化的规则，边缘者并非只有正面冲击或完全臣服两条路，还可以选择一种更为迂回、也更具创造性的曲线抗争。这种抗争路径不追求在既有规则内获胜，也不寻求直接的体制性推翻，而是通过模拟主流规则以获取必要的行动空间，挪用系统内的工具与话语以解构其权威，最终在局部实现关键性的突破与超越，从而在结构的缝隙中开辟出自洽的生存与抵抗领地。

米娅的曲线抗争，是一条以策略性周旋为特征的持久之路。她通过有策略的模拟，创造性的挪用，持续性的超越，以母职为不变的伦理锚点，以混杂性策略为柔性依托，在身份的流动与创作的实践中，始终坚守着不被规训的自我主体，坚定地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她以流浪-创作为生存常态，通过空间流动与职业选择主动疏离主流时间逻辑与职场规训，拒绝将母职等同于固定居所与中产价值观。艺术创作方面，米娅没有固定的雇主，不接受商业订单的约束，只为自己信任的艺术家工作，并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为了女儿的成长暂时结束流浪生活，却面临理查德森夫人所代表的第一世界母职标准的质疑与驱逐时，她并未妥协，而是以“模拟-挪用-超越”的动态混杂策略，以实际行动挑战并重写白人主流社会对母职的狭隘定义，完成对结构性规训的持续性超越。

相较之下，贝比的抗争则呈现为一条从迷失到觉醒的激进曲线。从被定义的他者到自主的建构者，贝比的每一步行动，都暗合着对文化霸权的解构，最终在混杂性实践中，为第三世界女性的母职形态开辟出被单一标准束缚的第三空间。起初，主流/边缘的二元对立让贝比成为被第一世界牢牢捆绑为“失语者”，她不敢反抗，更不知道如何反抗。直到米娅那句“这些人为什么要把孩子从母亲那里夺走呢”的诘问（伍绮诗，2018：258），彻底激发了她的母爱，让她最终带走女儿。贝比最终带走女儿并从系统中消失的决绝行动，标志着母职动力与混杂性策略的深度融合达到顶点。母职推动她超越第一世界规训框架，创造混杂性新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她的母职合法性无需依赖第一世界的制度认可，也无需被第三世界的传统框架束缚，完全以母亲与孩子的关系为核心定义。她带走女儿的行为，既不是对第三世界传统母职被动承受的回归，也不是对第一世界母职制度认可的妥协，而是自主争取权利，践行不被定义的母职。母职动力让贝比的抗争超越规训，走向主体性重构新形态；而混杂性则让母职动力摆脱了单一文化框架的限制，成为一种能在不同权力场域中灵活调适、却始终不丢失核心的抗争能量，最终完成从文化迷失到自主定义母职的蜕变。

米娅与贝比，一者以持久的韧性在结构中游刃并消解权力，一者以瞬间的决绝从结构中突围并彰显主权。米娅的持续性与贝比的瞬间性超越，并非高低之分，而是构成了边缘女性抗争的一体两面。米娅展示了如何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与之周旋并保持自我；贝比则展示了当周旋的空间被彻底封死时，那玉石俱焚的终极一击所具有的震撼力量。二者虽在策略形态与实践节奏上截然不同，但均以母职为支点，打破了种族-阶级-性别交织的规训结构，确立了少数族裔单亲母亲定义自身生存方式的可能。二者共同构成后殖民混杂性理论下，边缘女性以母职作为抵抗资源、实现文化身份重构与社会承认的重要实践范例。她们的抗争共同证明：在正面战场之外，边缘者的力量正在于其灵活性与创造性，她们能在模拟与挪用之间找到支点，以不同的方式，同样完成对压迫性结构的超越与对自我的重塑。

五、结论

在《小小小小的火》中，美国社会中两位少数族裔单亲母亲，华裔贝比与边缘人米娅，共同演绎了霍米·巴巴混杂性理论视域下，少数族裔女性殊途同归的抗争史诗。本文通过对比两位女性的母性反抗路径，揭示以母职为目标，混杂性作为具体战术的实践效能。米娅是自觉的策略家，运用模拟、挪用与超越的抵抗范式以女管家身份“模拟”白人社区的生存法则，却挪用艺术符号揭示理查德森家中被掩盖的真相，最终通过不断迁徙的流散生活，践行对母职身份的持续超越。贝比的抗争则代表从解构二元对立到建构第三空间的混杂性抗争，二者共同构成少数族裔女性反抗的不同阶段与形态，完整呈现出这类群体抗争意识与策略的演进轨迹。在分析二者的实践时，打破对反抗结果成功或失败的简单二分法，精细捕捉边缘群体抗争中的部分突破、阶段性成果与潜在局限至关重要，贝比的抗争虽未彻底改变司法制度，却实现了母职身份的自我确认，这一结果可归为局部成功。从进入规则——在规则内部博弈——最终创造新规则的完整抵抗路径，两位母亲的互动与抉择，强有力地证明了混杂性绝非被动同化，而是一种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能动性体现。面对强大的、无处不在的文化与政治霸权，弱势群体完全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混杂策略，在系统的裂缝中争取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在《小小小小的火》中，母职是两位少数族裔女性抗争的锚点，也是资源，在其他反抗文本乃至现实生活中，这一资源和锚点可以是职业，也可以是其他载体。所有处于边缘地位的人们用好霍米·巴巴的理论，不必害怕强权，要敢于并善于运用策略性思维，去争取、建构并言说属于自己的话语与空间。

参考文献:

- [1] 刘月莹. 2024. 主体性的觉醒 [D].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2] 伍绮诗. 2018. 小小小小的火 [M]. 孙璐, 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3] 王芳. 2023. “母亲”身份的再审视: 《小小小小的火》中的母性书写与社会批判 [J]. 外语教学, (5): 106-112.
- [4] 王元江. 2023. 西克尔高地的“白璧无瑕”: 文化理论视域下详析《小小小小的火》中的“种族色盲”现象与美国精英文化反思 [J]. 长江小说鉴赏, (5):46-53.
- [5] 王妮. 2020. 她们笔下的“她们”: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女性书写研究[D]. 西南大学.
- [6] 金莉. 2024. 后殖民女性主义[J]. 外国文学, (06):96-108.
- [7] BHABHA H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 [8] COBB S. 2024. Adaptation, Authorship and the Critical Conversations of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J]. New Review of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es, 22(1): 316-336.

Mimicry, Appropriation, and Subversion: Maternal Resistance in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Through Homi Bhabha's Theory

Zhang Yingfan¹

¹*School of English,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omi Bhabha's postcolonial theory of hybridit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sistance practices of two ethnic minority single mothers—Bebe and Mia—in Celeste Ng's novel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By integrating the gender-motherhood dimension, it summarizes their resistance paradigm of mimicry-appropriation-resistance and deconstructing binary oppositions-establishing third space, thereby constructing a strategic spectrum of resistance for ethnic minority single mothers. The analysis fully demonstrates the evolution of their resistance logic under the dual oppression of race and motherhood, aiming to argue that ethnic minority single mothers can transform motherhood into a strategic resource to counter structural oppression, affirm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Keywords: post-colonism;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women of ethnic minorities; resistance paradigm; maternal resistance